

# 速度座架下的人与共同体

## ——当代激进技术哲学与现代性批判

卓承芳

**内容提要** 以速度、虚拟、风险为核心特征的新技术座架已经成为当代新激进技术哲学话语的焦点问题。在通讯技术支撑下,新的空间组织形式发展起来,人的生存状况也发生了重要变迁,现代性亦开始向后现代转型,“远程在场”、“流动的现性”、“风险社会”成为新时代特征。在新的条件下,身体被技术殖民化、个体发生碎片化和非人化,在社会层面上,资本主义霸权的数字化、实在(感)的消失导致的生活的景观化、生活的流动和恐惧的普遍化导致权力的弥漫和个人之间的敌视也使共同体成为不可能。新的技术既压抑了自由和安全,但亦蕴含着新的解放可能,新的乌托邦前景取决于对新技术产生、发展和发挥作用的社会历史条件的批判。

**关键词** 速度 流动现代性 激进技术哲学 社会批判理论

卓承芳,三江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210012

在现代性批判中,技术一直是基础问题之一。随着技术变迁(如生物、网络信息等方面新技术的突破性发展)以及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新问题(如生态、社会不公正、恐怖主义等),激进技术哲学的理论前提和视角也不断地深化。从宏观方面讲,套用鲍曼的说法,20世纪的技术经历了从福特制工厂代表的宏大固定模式向纳米、生物和信息技术代表的精细灵活模式的跃升。与此相应,以速度、虚拟、风险为核心特征的新技术座架成为焦点,人和共同体的命运以新的方式得到审视,亦产生了新的政治学诉求。

### 一、现代性之断裂与新激进技术哲学底蕴

人们普遍感觉,经过战后复苏和繁荣,“后工业”社会结构、“后福特制”积累机制、“后现代”文化逻辑成为新的时代特征,而所有这些都与“后革命”语境中的技术爆炸发展有关。因此,技术批判甚至压倒传统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批判而为激进社会理论的逻辑支柱。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西方新马克思主义文论与空间理论重要文献翻译和研究”(15ZDB085)阶段性成果。

在理论上,最早面对现代性之断裂的一批思想家,几乎都是从技术框架入手。最早预言“后工业社会”的图尔纳、贝尔等人,其理论框架的核心便是知识或技术。例如,贝尔关于后工业社会的预见便是如下五个方面的内容:经济方面,从产品生产经济转变为服务性经济;职业分布,专业与技术人员阶级处于主导地位;中轴原理,理论知识处于中心地位,它是社会革新与制度政策的源泉;未来的方向,控制技术发展,对技术进行鉴定;制定决策,创造新的“智能技术”<sup>[1]</sup>。在某种意义上,这倒像是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的强势正向逆转。与这种正面阐述相响应的是以利奥塔为代表的对“后现代”文化的倡导和呼唤,其核心则是资讯技术<sup>[2]</sup>。

关于新技术座架下的社会特征,乌尔里希·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提供了一种深度分析。在贝克看来,“在现代化进程中,危险和潜在威胁的释放达到了一个我们前所未有的程度”<sup>[3]</sup>,以至于当代进入了与工业社会不一样的“风险社会”。贝克并没有展开对包括因特网技术快速变迁及其后果的细节,而是从“生产力的指数式增长”说明了现代化过程的断裂,这种断裂所形成的以不确定性、风险和威胁所代表的后秩序社会,即风险的生产和分配替了财富的生产和分配成为现代性的“逻辑”,正是这一点使得现代性生活成为火山之上的文明之舞。贝克的目标在于以中立的方式描述现代性逻辑之断裂以及新的结构。可以说,他恰当陈述了在新技术推动下现代性的当前状况,对于批判来说,揭示这一结构之后果乃是其要务。在结构主义支持下,从生态、性别、差异等后现代视角对新技术的多元批判早就开始了这一过程。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技术不仅表现为当代歹托邦的直接推手,因此构成了整个文化批评的焦点,甚至亦成为以高科技题材电影和游戏代表的大众文化消费的对象,而且产生了许多全新的批判和政治想象,例如K. 塞尔等人的新卢德主义思潮<sup>[4]</sup>,唐娜·哈拉维代表的“塞博格”女性主义<sup>[5]</sup>等等。

本文聚焦的是维希留、鲍曼等人的理论。他们支持贝克关于现代性断裂之说,将风险视为新时代的基本特征,转而测度新条件下的权力以及人之生存状况。在他们看来,新技术座架使速度和流动成为社会结构的中心原则,速度和流动本身成为权力,从而把每一个人都卷入与他人的对峙、对他人的监视之中。可以说,维希流之“速度政治学”和鲍曼的“流动的现代性”两种内在相契合的关于速度和流动的現代性批判,更为尖锐地触及了当代技术之本质,成为新激进技术哲学的最重要资源之一。鲍曼曾经留下一段精彩的概括,他说:

后现代境况有一个总体特征:它摧毁了时间,并使得对于可以无限扩展的时间流的感知凝结成对现在时间的体验,或者将其分割为一系列自足的片段,而每一个片段都是短暂瞬间的强烈体验,并且尽可能彻底地与其过去及未来刻后果分割开来。运动的政治正渐趋让位于竞选的政治,目的就是迅速获得结果,而对它们长期的影响却毫不关心;对长久(永久)声誉的关注让位于对臭名昭著的欲望;历史的持久与瞬间的(原则上也是可以抹掉的)的记录混为一谈;曾经意味着“超越坟墓”的艺术品让位于刻意使之短暂的意外事件和一次性的装置;原先要勤奋地建构并且使之终生不变的个性被更换为成套个性的工具箱,以便更适合于

[1][美]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高铨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0页。

[2][法]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后现代状况》,岛子译,[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96年版。

[3][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15页。

[4]K. Sales, *Rebels Against the Future: The Luddites and Their War o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New York: Addison 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1995.

[5]“塞博格”(cyborg)是哈拉维由cyber和organism合作的词,意即“网络电子生物”。参阅[美]唐娜·哈拉维:《类人猿、赛博格和女人》,陈静等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直接的装配以及同样直接的拆卸。后现代的新型永恒意味着要在瞬间经历,就在此时此刻享受,它不再是无情和难以控制的客观时间流的抵押品。<sup>[1]</sup>

鲍曼和维希留都认为,在交通特别是通讯技术支撑下,特别是随着全球信息网络的诞生,传统与巨型基础设施联系在一起的领土和城市空间以及与之一致的社会组织形式开始瓦解。新的“第三空间”出现了,它“不含任何空间的特性,却有不同凡响的即时传播的特性,从此,人们不再被物质的障碍和时间的阻隔分离。随着电脑终端和录像监测的接合,这儿和那儿的区分不再有任何意义”<sup>[2]</sup>。这样的空间便是“速度空间”,其最显著的特征便是流动性和不确定性。

与这种流动性和不确定性一致,人与世界都变成一个漂浮的瞬间性存在的内在分裂的平面图像。一方面,如海德格尔揭示的,世界成为对象,成为图像,即有待加工的与主体无关的对象。在新的信息技术支配下,图像化的世界更加虚拟化。另一方面,“全球化”标志着世界事务正在遵循的那些运作过程的“自然化”:它们基本上没有界限,也不受控制,获得了半自然的、不受规划的、无法预测的、自发的和偶然的特性<sup>[3]</sup>。在这种状态中,人成为被“流动的恐惧”(鲍曼语)驱动着的“远程在场”(telepresence)(维希留语)。按照传统的工具论视角以及恩格斯关于工具是肢体的延伸之创见,技术代表着的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中介物,那么可以说,维希留、鲍曼等人指认当代以速度为本质的技术,一方面作为人的“假肢”彻底地改变了身体的在场方式,另一方面作为空间的载体彻底地改变了社会存在性质,在总体上,推动形成了以“超极权主义”(transcend totalitarianism)为特征的虚拟城市世界,这使人成为流动的生活片断,把人投入“流动的恐惧”之中。这也就以不同的方式诠释了今日“风险社会”或后现代境遇之内涵。

## 二、速度、流动与个体的命运

“控制自然并未带来人的自我实现;社会现实状况依旧表现出其客观的强制。在当代,人口日益增加,技术全面自动化,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日益集中,作为工厂工作的结果之个体不断地地理性化,这一切都在某种程度上把组织化和操纵化强加给生活,使个体只能自地沿着他们为他指定的道路前进。”<sup>[4]</sup>尽管在今天,技术变迁已经超出了霍克海默的想象,但他关于个体的命运之说仍然成立,不同的只是“组织化和操纵化”的方式和程度加强了,新的速度技术塑造了新的个体命运:身体的殖民化、个体的碎片化以及人的非人化。

### 1. 速度政治中身体的殖民化

在技术支配下,身体逐渐由主体转为客体。这已经得到普遍的承认。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对这一过程产生了哪些影响呢?关键在于速度。在一般意义上,现代信息科学技术对于身体具有两个至关重要的影响:一是阻断梅洛·庞蒂所讲的身体与世界之间关系,为身体安上假肢(prostheses),变成一种技术知觉,即人的感知按照外部设计去感知世界;二是让身体仅仅停留于视听层面感知世界,如鲍德里亚所言,利用一些可以刺激人的视觉的广告实现消费产品的欲望,或者用维希留的话讲,让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停留于视觉冲击。在这是最深刻的霸权,对人的内在地彻底殖民。

维希留认为,工业化生产早就开始了知觉自动化,即通过发明人工视像,将对客观现实的分析委托给机器,最终将形成视觉机器(vision machine)时代。在这种条件下,身体获得了新的假肢,不过新的假肢不再是物质性的新陈代谢的载体,而是一台终端机、一个视觉机器。在他看来,现代电脑技术

[1][3][英]鲍曼:《个体化的社会》,范祥涛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300页,第149页。

[2]Paul Virilio, *The Lost Dimension*, New York: Semiotext(e), 1991, p.13.

[4][德]霍克海默:《霍克海默集》,渠东等译,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版,第231页。

以一种外在和内在的嵌入方式,最大限度地拓展了人的综合能力,实现了人类扩大视域范围和加速交流的目的,与此同时,这种技术内殖民化最终实现了技术对人类身体的“殖民化”,人体被技术“吞噬”,“入侵”和“控制”<sup>[1]</sup>。人类不仅是坐在视觉机器之后的观看者,也是被视觉机器时刻监控的表演者,随着大量电视、电脑、卫星技术和电话答录机等技术的广泛使用,私人空间公开化,公共生活数码化,日常生活成为一种陶醉于“数码经历”中的感知混乱,社会则陷入“游戏盲目的长夜”。数码威力和意志主宰我们的知觉行为<sup>[2]</sup>。这是梅洛·庞蒂所指的“闭上双眼的恐慌”,“大威慑纪元之初的恐慌!”当即时通讯的能力取代了所有真实存在,当远程透视感知让工具式图像将一张一张赶走我们最后的精神意象<sup>[3]</sup>。这种技术入侵几乎重构了我们生活的世界,维希留指出,速度已经不能满足以往的向外殖民(exo-colonisation)而转向对人类社会的向内殖民(endo-colonisation),这种向内殖民不是地缘政治上的空间殖民,而是时间政治的身体殖民,或者说是一种“去殖民的殖民”形式<sup>[4]</sup>。这种技术对身体的内殖民化恰恰导致我们越发远离客观世界,亲近技术世界,已经成为当代最深刻的存在危机。

## 2. 流动现代性条件下的个体分裂

与维希留一样,速度是鲍曼的关注中心,不过,他并不仅仅将目光盯着新技术,而是试图从现代性的结构角度来把握速度的内涵,提出“流动的现代性”主张。在鲍曼看来,现代性意味着传统的持续瓦解。这并非新颖之见,而是马克思和波德莱尔以来现代性理论的中心观点。鲍曼接受了这一思想,将“创造性破坏”过程视为现代性之本质特征。客观地说,鲍曼的描述并没有超出马克思和伯曼<sup>[5]</sup>。像马克思那样,他将这一本质与资本积累逻辑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与伯曼一样,他注重现代性的体验。不同的是,他接受了乌尔里希·贝克关于现代性断裂的划分以及对当代所做的“风险社会”定义,在此基础上,他深入分析“液化”了的现代性结构之社会后果。在他看来,晚期现代性,或流动的现代性条件下,“由于速度最新获得了可变能力和扩张能力,首要的是,‘现代时代’已经成了征服空间的武器。……在现代时期里,运动速度和更快的运动手段在稳步增长,挑拨了最为重要的权力工具和统治工具”<sup>[6]</sup>。当“速度、交通工具的使用和由此产生的移动的自由,一起构筑了权力金字塔”<sup>[7]</sup>，“流动的自由”便成为人人垂涎的价值<sup>[8]</sup>,流动性便替代了空间(或固定位置)成为划分社会阶层因素,在其支配下,新的、越来越具有世界性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阶层每天都发生着不断的重建<sup>[9]</sup>。

由此,鲍曼讨论了人的碎片化的诸多逻辑和表象。在归根结底意义上,最重要的乃是生活的流动性,“支离破碎的生活往往分割为片段,分割为一系列互不联系的事件。存在分割为碎片,生活分割为片段,没有保障就是其中的切分点。除非采取措施以对付毫无保障这一挥之不去的幽灵,否则几乎没有可能恢复对永恒和耐久的价值的信任”<sup>[10]</sup>。流动的生活,“意味着不断的自我审视、自我批评以及自我责备”,甚至,“靠的是自我对自的不满”<sup>[11]</sup>。这带来的后果是,“人们的个性特征,即他们的自我形象,就像其他任何东西一样都很多碎片和组合,每个碎片都必须臆造、携带和表达各自的意义,经常无

[1] John Armitage, *Virilio Live: Selected Interviews*, London: Sage, 2001, p.43.

[2] [法] 保罗·维利里奥:《视觉机器》,张新木、魏舒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45-146页。

[3] [法] 保罗·维利里奥:《无边的艺术》,张新木、李露露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5页。

[4] [法] 保罗·维希留:《消失的美学》,杨凯麟译,〔台北〕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24页。

[5] [美] 马歇尔·伯曼:《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徐大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6] [7] [英] 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欧阳景根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4页,第15页。

[8] [9] [英] 鲍曼:《全球化:人类的后果》,郭国良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页,第9页。

[10] [英] 鲍曼:《个体化的社会》,范祥涛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04页。

[11] [英] 鲍曼:《流动的生活》,徐朝友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2页。

须参照其他的碎片”<sup>[1]</sup>。在《生活在碎片中》，鲍曼强调，因为对被束缚和固定的恐惧，四种生活策略及其组合成为后现代的核心特征，它们是：漫步者、流浪者、观光客和比赛者。每一个人都在这种策略（也即身份）之间游走和变化，因此，每一个后现代个人都忍受着严重的精神分裂症的苦恼<sup>[2]</sup>。其最终的政治影响便是共同体（即公共生活）不再可能。这是因为，这一结构导致了从“整体政治”向“生活政治”的狭隘关注范围的转移，而这种转移本身阻止着最终形成集体行为的其他模式<sup>[3]</sup>。

### 3. 在虚拟世界中的非人化

在维希留那里，知觉身体已经在技术模式中丧失了自然的性质，而在全新的数字化技术条件下，它的最终前景将会如何，则是新激进技术哲学的中心问题。这个问题因为一些乐观的新未来主义者的鼓吹而复杂化了。例如尼葛洛·庞帝提出数字化生存问题，把物理世界与数字世界在比特之上统一起来。这也意味着，我们不仅可以把一种声音、一条光线，而且可以把社会和人都“还原”到基本的数码系统，进行储存、复制、运输甚至改造。在逻辑上，人们会自然地提出这个问题：是否意味着也可以把氨基酸的特征数字化后进行改造，以及进一步，人的个性特征也是否能够通过数字化进行重塑？像鲍德里亚、利奥塔等等这样的后现代预言家对此提出了警示的思考。

在利奥塔看来，“无论什么样的物质体系，只要能过滤出有益于生存的信息，储存，处理，调整欲求，归纳行为，就是说至少能归纳调整，对保证其生存的周遭进行干预，就是技术。”不过，发展到今天，在计算机时代或信息时代，技术—科学的问题可以表述为：“保证为独立于地球生命状态之外的硬件提供这种软件（即思维、语言等——引者注）。或者：使一种无身躯的思维成为可能。使它在人类身躯死亡后思维仍是可能”<sup>[4]</sup>。正是基于这一立场，利奥塔直接对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后果提出了否定性的判断，他强调：

今日科学研究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怎样消除身躯对交流技术发展或不断扩展的新式记忆的排异性。很有可能这就是将来的授精、妊娠、生产、疾病、死亡、性别、体育等研究课题的真正赌注。一切似乎都会集中到同一个目标上：使人体能在非地球条件下存活，或者给人另换一副“躯体”。……遍布地球的电子和信息网生出了一种应被视为宇宙级的，非传统文化价值可比的记忆总体能力。这种记忆意味着的一种奇论在于，它最终将不是人的记忆。而“人”在这种情况下的含义是：支撑这种记忆的躯体不现是一具地球人的躯体。计算机综合更多的时间段（“次”数）的能力不断增长，所以莱布尼兹才能够说他正在孕育一个比人类本身从未能达到的更加“完美”的单子。<sup>[5]</sup>

虽然这种描述方式具有科幻的特征，但其基本思想是清晰的：任由技术按照自身逻辑发展下去，就是终结的图景。

## 三、速度、不确定性与共同体的命运

个体的命运不是共同体命运的反面，在直接意义上，它是共同体命运的后果，尽管在逻辑上，如马克思阐明的那样，“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sup>[6]</sup>。通过对速度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个结论：在加速度中，结构不仅地历史地抽象化了，而且实体化了，这使得其构成要素愈发丧失独立性的外观，“自主性”结构成为获得帝国的形式。正如鲍曼所言，流动的现代性破坏了社会团结的

[1][3][英]鲍曼：《个体化的社会》，范祥涛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02页，第189页。

[2][英]鲍曼：《生活在碎片中》，郁建兴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109页。

[4][5][法]让-弗朗索瓦·利奥塔：《非人》，罗国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4页，第69、71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4页。

基础,因此,“社会”已经被越来越多地视为一种“网络”非“结构”(更不要说一个稳固的“整体”):社会被人们认识为包含各种随意性的联结和分离的矩阵,一个可能出现无数种排列组合方式的矩阵。<sup>[1]</sup>更通俗地说,社会变成了一个像乐高玩具那样任意组合的机械装置。在此语境中,人类共同的命运也就变得不确定了。这个问题也是全部新激进技术哲学的共同关切。在展开这个问题的讨论中,既有生产方式霸权的数字化、实在(感)的消失导致的生活的景观化、生活的流动和恐惧的普遍化导致权力的弥漫和个人之间的敌视,这些新技术之后果也浮出水面。

### 1. 既有生产方式霸权的数字化

所谓“数字化”在今天仍然具有比喻的性质,它指涉的世界虚拟化,并非意味着现代性社会结构真正地摆脱了物质载体,而是可能暗示着由于它摆脱早期粗陋的形式而获得了新型的更为纯粹和精致的形式。这一点可以从货币和资本这样的术语所指变化来理解,在早期资本更多的是以实物方式存在的,后来具有明确的货币形式,在银行清算中它只是代表一组数字,而在今天所谓的“资本运营”中是没有哪个资本家会提着钱去完成交换活动的。电子商务、“电子货币”甚至游戏中的各种叫法的“货币”,都指向一个逻辑问题:货币在其本质上只是一种抽象,在全球网络信息社会中,数字价值单位(DVU)呈现了其真正的本质。而这种数字化不仅没有改变既有生产结构,相反,它实际上加强了当代资本主义的霸权。就此而言,当代技术哲学和社会批判理论已经充分地讨论了权力的非实体化问题,人们认识到,因特网将拯救人类只是古老愿望的表达,技术自身并不承诺什么,相反,在新自由主义或以市场为导向的政策下,电信系统已被赋予一种全新的社会目的。这种剧变增强了跨国公司的实力,同时也加剧了现有的社会不平等现象。正是因为这一点,形成了洋洋大观的媒介帝国主义批判思潮。

在这一思潮中新路德主义者赫伯特·希勒(Herbert Schiller)等人通过对媒介的分析则强调,在信息技术的一切领域,创新的潮流追随无情的商品化。新卫星、光纤和计算机网络被用来制造媒体的爆炸,其媒体表面的多元主义已被淹没,少数巨型媒体联合体几乎完全吸纳了数以千计的报刊、广播电台、电视频道和电缆系统。所有权导致了更为直接的意识形态控制。因此,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已经变成了“控制论资本主义”。例如约翰·帕克(John Parker)通过一手调查写成的《全面监控》以大量的资料说明了我们这个世界正在成为被电子监控的牢笼。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它非但没有受到社会的控制,在某种意义上反而成为控制的工具,另一种全面监控的象征。因此作者在尾声中说:“事实上,在为个人隐私而战的斗争中,社会已经输了”<sup>[2]</sup>。这个观点得到了广泛的支持,例如夏皮罗(Andrew Shapiro)便强调,在地球村时代,沉默的、无所选择的大众已经沦陷在一对多的广播中,随后又被囚禁在一对一的网络中<sup>[3]</sup>。

### 2. 实在的消失与生活的景观化

对于多数激进主义思想家来说,新的信息技术最终后果将是扼杀实在。这个观点因为鲍德里亚而广泛为流传。在他看来,“追索着由技术本身生出的功能性神话,我们会发现某种宿命性,在此原来为了主宰世界的技术,结晶为一个反向的且具威胁性的目的性。”<sup>[4]</sup>从这个观点进一步来透视信息与通信技术,他讽刺道:

实在是一条母狗。这有什么奇怪的?它就是愚蠢和善于算计的私生子,是献给科学骗子的神圣幻象的垃圾。……影像不再能让人想象现实,因为它就是现实。影像也不再能让

[1][英]鲍曼:《流动的时代》,谷蕾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页。

[2][美]约翰·帕克:《全面监控》,王帆等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67页。

[3]Anthony G., Wilhelm, *Democracy in the Digital Age*, Routledge, 2000.

[4][法]让·鲍德里亚:《物体系》,林志明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1年版,第143页。

人幻想实在的东西,因为它就是其虚拟的实在。……在我们生活的世界里,用符号来使实在消失并掩盖它的消失。……这就是变化,它有可能在不断增加的信息中消失,并最后在绝对信息中消解:世界——最终的幻觉,即对一个完美的、完成的、犯罪造成的、完善的、达到存在和实在顶点的、已尽其所有可能的世界的幻觉。坦率地说,是上帝经过了这个信息和复杂化不断增加的、检验实时世界的过程;是上帝在世界被其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搞得精疲力尽以后,主宰幻觉世界的崩溃,拟象的、虚拟实在的世界的复兴。是上帝主宰世界的无条件实现和对其最终的幻觉。<sup>[1]</sup>

在维希留看来,全球网络所展现的是一个“全世界都远程在场的社会”,没有空间扩展,没有时间延续,只是一个强烈地各处在场的社会<sup>[2]</sup>。实际上,不断加速的新技术使人类存在时空感逐渐与原初存在感逐渐疏离,被超级装备了各种互动性假肢的健全人的身体,不必在物理上进行位移就控制他的周围环境<sup>[3]</sup>,这决定性改变了在场方式。所以,他强调,在多媒体技术中,我们目睹的是当前(present,即“在场”)的深度,一个不断膨胀的当下,而实质上,它只不过是远程通信的真实时间的突然世界化。它在世界范围内制约着人类的行动。这个远程时间世界化所形成的空间对于我们的生存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维希留说:“现在,让我们自问,明天,一种不再是在一个街区、一个城市或是一个地区的地方化空间里,而是在一个当前的无终结永存的时间里的定居性,会成为什么:当今的人不再能达到任何东西。”<sup>[4]</sup>在他看来,多媒体本身就是启示录,“它将摧毁任何的再现思考,从而形成一种个体的恐慌式条件反射,其(从伦理和审美的)相对主义在这种替代的虚拟主义面前会突然消失,而虚拟世界将替代经过证实的事实和事件的真实世界”<sup>[5]</sup>。当然,他所称代替真实世界的虚拟世界,并非如鲍德里亚那样是一个真实消失的拟像世界,而是与传统不一样的在场方式。在这种在场方式中,生活成为景观秀(spectacle show),一切都按控制论模式设计好的,解除了人们的意志,使人们成为期待意外的无意识存在。

### 3. 流动性权力与共同体的不可能

维希留已经指出,在速度推动的战争中,在追逐速度中,世界成为“速度帝国”。在这个世界中,“速度等于法西斯主义”,即控制人口的极权主义<sup>[6]</sup>。这也即是《黑客帝国》等电影的隐喻。在鲍曼看来,这便是流动的现时代性之特征。不过,他关注这两个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经验问题:阶级分化中的权力以及为个体提供安全庇护的共同体。

鲍曼认为,传统是一种运动,这种运动旨在达到一种边界,且一旦边界达到,运动本身便为维持这一边界的努力,而现代恰恰相反,它旨在超越边界,并且这种不断超越的运动扩展了它的超越能力和它可能到的边界,故而它是一种狂躁。这种差异是由速度造成的,他认为,构建的、分隔的所有其他社会产物和集体特性的维护(如国家疆界或文化障碍)似乎都只是那速度的副产品。当然,他更强调,“边界事实”在部分时间里都是造成阶级分层现象的原因<sup>[7]</sup>,从而把关注的焦点放在新的速度与新的分化上。鲍曼进一步认为,在流动的现时代性时代,统治的竞争不是在“更大者”和“更小者”之间展开,而是在更快者和更慢者之间展开的。是那些能够以超出对象的追赶能力的速度加速的人们在统

[1][法]让·鲍德里亚:《完美的罪行》,王为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8、10、12页。

[2][3][4][法]保罗·维利里奥:《解放的速度》,陆元昶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3-35页,第45-46页,第183页。

[5][法]保罗·维利里奥:《无边的艺术》,张新木、李露露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1页。

[6]Simon Glezos, *The Politics of Speed: Capitalism, the State and War in an Accelerating World*, ProQuest LLC 2009, p.91.

[7][英]鲍曼:《全球化:人类的后果》,郭国良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2页。

治者<sup>[1]</sup>。他强调,现在权力的首要技巧,是逃避、是溜走、是取消、是避开,是有效地拒绝任何地域的限制,是拒绝建立秩序、维持秩序所必然带来的不堪重负的结果,是拒绝像去承担它们必须承担的代价一样,去对所有后果承担它们必须承担的责任<sup>[2]</sup>。

在速度战中,数据库是一种选择、分隔和排斥的工具<sup>[3]</sup>。这一点已经得到公认。不过,多数研究者都试图借助福柯来说明其权力性质,如波斯特便认为数据库是作为一个超级全景监狱运作的。他说:

数据库像监狱一样,连续不断地在暗中有系统地运作着,收集个人资料并组合成个人策略。与全景监狱所不同的是,这些“囚犯居民”无须关住在任何建筑物中居住;他们只须继续进行其刻板的日常生活即可。因此,这种超级全景监狱与它的前一代相比更为侵扰他人,然而它完成规范化这一任务的效率却绝不降低。……与过去的权力机制相比,新权力机制的另一优势是其传播或说信息传输的便捷性。用电脑交换数据库极其方便,一台机子上的信息从其他机子上也能获取。数据库的信息瞬息之间就可能流过全球范围的赛博空间,对人们实施监控。数据库无须任何狱卒的眼睛就能“审查”我们,而且它们的审查比任何人都更加准确、更加彻底。<sup>[4]</sup>

在直接的意义上,这几乎是所有科幻作者的叙事框架。与之不同,鲍曼支持马特森(Thomas Mathisen)的看法,后者针对Panopticon(全景监狱)一词杜撰了Synopticon(对视监狱),表示在全球信息社会,权力是多数人监视少数人,在这种模式中形成了“对视社会”(the viewer society)<sup>[5]</sup>,即围观社会,就如今天网络上的围观现象。在鲍曼看来,全景监狱不同,数据库是流动性的载体,而不是将人们束缚在原地的枷锁<sup>[6]</sup>。正是在对视模式中,个人被迫生活在流动的恐惧之中,等待着偶然性的命运降临。因为,在这样的社会中,人际纽带是十分脆弱的,人们难以形成真正的公共生活并以此为纽带结成真正的共同体来保护自己的安全。所以,在总体上,鲍曼将后现代时代视为技术解除了传统社会团结纽带而迫使个人成为事实意义上的个体的状况。这种状况亦是一种“流动的恐惧”,并且,

恐惧最令人恐慌之时,是在它弥漫开来、呈分散之势时,这时的恐惧模糊不清、无依无支、自由飘荡,谁也不知它从何而来又当如何处置;恐惧莫名其妙地困扰着我们,我们所害怕的威胁似乎处处可窥见,却又无处得见。<sup>[7]</sup>

从新技术时代的速度、虚拟座架下的人与共同体状况看,可以说,正如鲍曼指出的那样,不仅启蒙追求的自由没有实现,而且最重要,安全似乎在今天也丧失了。从理论上讲,在今天,启蒙意义上的解放成为更为迫切的历史任务。然而,当代理论似乎更关心新的信息技术以更直接和激烈的方式刷新世界的性质和人的存在这个事实,而压抑了对技术产生作用条件的批判,更具体地说,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因此,大量的以新技术为基础的激进政治表述风起云涌般传播开来时,批判本身似乎也因为多元化而丧失了其对社会历史直接干预的可能性。

[责任编辑:曾逸文]

[1][2][英]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欧阳景根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92页,第16页。

[3][6][英]鲍曼:《全球化:人类的后果》,郭国良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49页,第49页。

[4][美]马克·波斯特:《第二媒介时代》,范静哗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97-98页。

[5]Thomas Mathisen, "The viewer society: Michel Foucault's 'Panopticon' revisited", *Theoretical Criminology*. Vol. 1 (2): 215-234.

[7][英]鲍曼:《流动的恐惧》,谷蕾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页。